

## 目摇摇录

红楼点滴一 .....	员
红楼点滴二 .....	源
红楼点滴三 .....	苑
北大图书馆 .....	员
辜鸿铭 .....	缘
章太炎 .....	园
黄晦闻 .....	愿
马幼渔 .....	猿
熊十力 .....	猿
胡博士 .....	猿
刘半农 .....	源
俞平伯 .....	源
朱自清 .....	缘
叶圣陶 .....	愿
吕叔湘 .....	源
温源宁 .....	苑
季羨林 .....	缘
启功 .....	愿
刘佛谛 .....	猿
张守义 .....	源
王门汲碎 .....	园

银闸人物 .....	员苑
汪大娘 .....	员怨
凌大嫂 .....	员猿
怀疑与信仰 .....	员苑
天道与人生 .....	员猿
安于不知天 .....	员愿
月是异邦明 .....	员员
关于读书明理 .....	员怨
红学献疑 .....	员愿
临渊而不羡鱼 .....	员远
德·理·力 .....	员员
知惭愧 .....	员缘
生命 .....	员园
机遇 .....	员猿
信仰 .....	员苑
贫富 .....	员源
聚散 .....	员园
顺逆 .....	员缘
身后 .....	员园
清风明月 .....	员苑
蓬山远近 .....	员员
梦的杂想 .....	员远
神异拾零 .....	员员
彗星 .....	员源
才女·小说·实境 .....	员怨
无题 .....	员缘

剥啄声 .....	圆原
但目送芳尘去 .....	圆原
犊车驴背 .....	圆苑
城 .....	圆苑
桥 .....	圆远
户外的树 .....	圆园
案头清供 .....	圆原
旧燕 .....	圆苑
螳螂 .....	圆园
蟋蟀 .....	圆缘

## 红楼点滴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座位号,空位面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

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装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四月,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 红楼点滴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

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 ~~蔡邕~~ 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

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按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按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 红楼点滴三

点滴一谈散漫 二谈严正 还可以再加一种 ,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 ,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 ;有 ,口才差 ,讲不好也不成 ;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 ,因为学生不只听 ,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 ,既有不买票的自由 ,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 ,真是面目一新 ,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 ,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 ,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 ;不过只要买了票 ,进场入座 ,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 ,学生都不会喊倒好 ,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 ,你干你的 ,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 ,是英文组 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 ,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 ,课讲得不坏 ,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儿总让学生温习一下 ,这一段空闲 ,她坐下 ,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 ,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 ,因为是“老”师 ,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 ,简直有点愕然 ;及至看看别人 ,都若无其事 ,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 ,是顾颉刚先生 ,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 ,在北京大学兼课 ,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 ,学问渊博 ,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 ,善于写文章 ,下笔万言 ,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 ,与其角者缺其齿 ,口才偏偏很差。讲课 ,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 ,吃吃一会儿 ,就急得拿起粉笔在

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做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糊里糊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读)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抄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按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

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 北大图书馆

文章标题不宜过长,所以只好把本该写在前面的“我上学时期的”几个字略去,“北大”也用了简称,全称是要写为“国立北京大学”的。这时期的图书馆在松公府,是新由红楼地下室迁入的。这至少是再迁,因为据旧同学录“沿革”部分所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即建校之后四年)设置藏书楼,地点是在“学校后院”(推想就是应保存而于七十年代拆掉的所谓“公主楼”)。为了校外人看到这里不致茫然,这里要翻翻旧账。所谓学校,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经过许多波折,最后才成为“北京大学”的。且说创立时的校址,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的府第,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借庙名为街名)西部路北。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在其东沙滩汉花园建红楼,后用作文科教室,称第一院(文学院),原马神庙(改名景山东街,不久前改为沙滩后街)校址降为第二院(理学院)。专说第一院的扩张情况。红楼邻街,坐北向南,为四层砖木建筑。其背后有属于松公府的空地,再北偏西是松公府。先是一九一八年,学校租空地作操场,到一九三一年,一劳永逸,连府也买过来。府有几进房屋,相当好,稍加修整就把图书馆和研究所国学门迁进去,馆在前,所在后。馆藏书不少,所藏古物不少,至今还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珍贵家当。我一九三一年暑假后上学,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刚启用,一九三五年暑假后离开学校,新图书馆已经建成(在

府门西南)馆即将升迁,所以说句笑话,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共始共终。又所以,谈闲话就不该漏掉它。

当然,谈它,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我还年轻,很糊涂加多幻想,盲人骑瞎马,而它,像一束微弱的光,有时照照这里,有时照照那里,就说是模模糊糊吧,总使我仿佛看到一些路。这样说,提到图书馆,我是应该永远怀有感激之情了。也不尽然,因为它给我的是一些“知”,而知,根据西方的最上经典,来于伊甸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受了蛇的引诱才吃,得的果报必是“终身劳苦”。但木已成舟,也就难于找到解救的办法,因为生而为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比如说,坐在哪里,面对众人,说些自己绝不相信的“天子圣哲”之类的话,练练,不难;至于静夜闭门,独坐斗室,奉劝自己相信鞭打就是施恩,那就大难。大难,想做也做不到,只好不做。话扯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说,四年出入图书馆,我确是有所得,虽然这所得,用哲学的秤衡量,未必合理,用世风的秤衡量,未必合算。

该言归正传了。且说那时候,北大有些学生,主要是学文史的,是上学而未必照章上课。不上,到哪里去?据我所知,遛大街,以看电影为消遣的很少;多数是,铁架上的钟(在红楼后门之外稍偏西)声响过之后,腋夹书包,出红楼后门,西北行,不远就走入图书馆。我呢,记得照章应上的课,平均一天三小时,减去应上而理应听的,不应上而愿意听听的,剩余的时间还不少,就也夹着书包走进图书馆。经常走进的房子只有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不大,用处用不着说;第二进是阅览室,很大,用处也用不着说。两个室都有值得说说的,因为都有现在年轻人想也想不到的特点。

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名永平,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

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的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真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布置没有什么新奇,长方形比书桌大很多的木板大案,不远一个,摆满全室,案两面各有几把椅子,是供阅览者坐的。往图书馆,进室,坐在哪里,任随君便,只要那里还没有人坐。但是既已坐下,就会产生捷足先登的独占权。所谓独占,不同于现在的半天一天,而是长时期。这长时期,来于借书还书的自由主义。具体说,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书多少,数量不限;另一方面是借的时间,长短不限。此外还可以加上一种小自由,比如我们一些几乎天天来的看客,座位有定,借书,大多是送货上门。这样,借的书,有的短期看不完,有的常常要翻翻,就不是勤借勤还,而是堆在面前,以逸待劳。现在还记得,我的位子在室的东北角,面前的书,经常堆成小山岭,以至对面那位的活动情况,看什么书,是否记笔记,一点也不知

道。前面说过,图书馆藏书不少,我,颇有现在一些旅游家的心情,到北京,不只著名的燕京八景要看看,就是小胡同,只要有感兴趣的什么人住过,也想走进去,摸摸残砖断瓦。于是而借这个借那个,翻这个翻那个。就这样,许多书,大块头的,零种的,像游鱼一样,从我的面前游过去。由自己方面说,是跳到古籍的大海里,尽情地扑腾了一阵子。结果呢,如果也可以算作有所得,这所得,至少就上学的四年说,完全是也奉行自由主义的北大图书馆之赐。这里需要加点说明,是我并不提倡这方面的自由主义也向外扩张,向下流传,原因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图书馆的任务,方便读者的一面当然要重视,但还有另一面,是看守,防止损坏丢失,这后者如果一放松,那就不堪设想了。

说到向下流传,我不由得想到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真够得上发扬光大了。迁到原燕京大学,新建了既高大又豪华的楼房。书,吞并了燕京大学收藏的,加新购,据说就数量说,已升到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善本,甚至孤本,也不少。这新图书馆,我也利用过,是几年以前,因为考证有些旧人旧事,须查善本。照章,带着介绍信,还求副馆长版本专家郭君打了招呼,才拿到善本室的阅览证。善本室的工作人员也和善,但照章,要先查卡片,写好书名和编号,坐等。找到,要先交工作证和阅览证,作为抵押,然后领书。看完,还要立即归还。对于防止善本的损坏丢失,手续再增加,我也谅解;只是借到的书,有的盖有旧北京大学的印记,我看看,想想,感到那样多的书,那样长的过往,都离我太远了,不禁为之惘然。